

# 杜聰明與臺大醫學院——戰後初期臺灣醫政關係的 一個個案觀察

Dr. Tsungming Tu and the Medical Colleg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鄭志敏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摘要

戰後早期的臺灣醫界，熱心於建設臺灣以報效祖國，「以醫輔政」的意願強烈，但在「二二八」之後，醫界人士對政治轉為冷漠，「以醫遠政」成為普遍現象。國民黨政權遷臺後，醫政關係中摻入複雜的臺美利益與族群情結，政府「以政干醫」與「以政制醫」的手段逐漸出籠。歷經日治至國府兩個不同世代的首位臺籍醫博杜聰明，身處戰後初期醫政關係變化的風暴中心，雖然一度企圖「以醫抗政」，但卻終究不敵政治壓力。最後被迫從臺大醫學院長之位離職，而成為醫政關係惡化下的祭品，臺大醫學院也因此改變其自創辦以來的日本式體質。

關鍵字：杜聰明，臺大醫學院，醫政關係

## 一、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的「醫政關係」，呈現出一種「以政領醫」的現象，統治者以醫學為達成其政治目的的重要工具。因此不論是在統治方針論述或政策權力展示上，都表現出「抑中揚西」的政策目標，在國家權力的強力介入下，迫使臺灣人改變傳統的醫療行為，也改變傳統社會對於醫療從業人員的價值認知，進而強化臺灣人對主導此一改變的執政者之認同感<sup>1</sup>。

一九四五年終戰之後，對於多數受德日制醫學養成教育的臺灣醫界人士而言，政權轉移所象徵的意義，不只是統治者的改變而已，更意味著日治以來的醫

---

<sup>1</sup>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醫政關係的討論，可詳參葉永文，〈日據時期台灣的醫政關係〉，《台灣醫學人文學刊》第4卷第1、2期，2003，頁48-68。

政關係，將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從戰後到國民黨政權播遷來臺之初，臺灣歷經多次政治軍事上的重大衝擊，尤其二二八事件時期，醫界人士多人遇害，大大地改變了醫界生態，也連帶影響日後的醫政關係。國府在臺重建政權後，又因依賴美援，進而引進美式醫療政策與醫學教育模式，從本質上改變了半世紀以來沿之成習的德日制醫學體制，而成爲今日臺灣醫學的主流。在此政權由日治而國府、醫學由德日制轉爲英美制的過程中，臺灣的醫政關係呈現出一種如何不同於日治時期的風貌，是本文想要探討的主題。

杜聰明（1893--1986）堪稱是近代臺灣醫學史之代表，他一生歷經清治、日治與國民黨政權等三個不同歷史時期，日治時期從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留學京都帝大，成爲史上第一個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的臺灣人。從此杜聰明憑藉自身的努力與日本當局的刻意栽培，幾乎成爲充滿臺日種族歧視與差別待遇的日治時期，在學術界獨領風騷的臺灣人，一路從醫專教授而爲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其文官位階更達前所未有的敕任高等官一等，可說是日治時期「以政領醫」的醫政關係譜系中，最受殖民當局重用的本土臺灣人。但杜聰明並不因受日本當局的器重，而爲臺灣民眾所排斥，相反地，很多日治時期活躍的政治社會運動者，如蔣渭水與蔡培火等人，皆與其有極深厚的交情。因此，杜聰明雖以他良好的醫政關係，活躍於以日本人爲主的學術圈，並得到殖民當局的認可而成爲「殖民樣板」，但另一方面，他也因本身的強烈民族意識，未曾做出傷害臺灣人的事，而能得到一般臺灣人的敬重，這使他得以成爲臺灣學子心目中的「殖民英雄」。身份特質如此特殊的杜聰明，在戰後的國民黨政權統治下，卻有著與其在日治時期異族統治下截然不同的命運。從杜聰明的身上，可以看到一個戰後初期臺灣醫政關係的縮影，理解國府當局如何在族群競爭、美援壓力與「教育學術爲政治服務」等理念下，建構其「以政領醫」的觀點與設計，也可以見出醫界人士力圖「以醫抗政」的掙扎與無奈。

## 二、「二二八」前後的杜聰明與政治

杜聰明因爲在日治時期身居醫界要津，又普受臺灣人敬愛，因此日本戰敗後，並未影響到他的社會地位，早期的接收工作上，國府託付於他的還不少。包括臺北帝大醫學部與附屬醫學專門部、臺北帝大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及臺北日赤醫院、臺北更生院等醫療與教育機構，都委由杜聰明率隊接收<sup>2</sup>。一九四五年年底，他更一人身兼省立戒煙所（前身爲臺北更生院）所長、臺大醫學院院

<sup>2</sup> 杜聰明當時組成一個接收六人小組，成員以他本人爲首，另外五人是李鎮源、翁廷俊、許燦煌、許強、賴肇東，多數接收事宜與日後臺大醫學院與附屬醫院的人事與編制問題，都由此六人小組開會議決。參楊思標等編，《楓城四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85），頁49。

長兼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等要職，其中對杜聰明最重要的，當然是臺大醫學院的院長。這是一個日治時期他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爭取到的職位，如今日本戰敗，祖國果然爲他帶來新的希望，但是杜聰明也很快發現，這個祖國政府與他原先的假想，似乎有著頗大的距離。

雖然以杜聰明爲首的臺灣醫界人士，大都抱持戒慎恐懼的興奮心情，迎接臺灣的光復，不過由於戰爭時期的破壞，特別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美軍轟炸機對臺北城的大轟炸，導致臺大醫學院與附屬醫院，硬體設施均遭受極大之破壞，師生也有數人受害。加上戰後大多數日籍醫師與教師均遭遣返，在教學與診療實務上，不免有青黃不接的現象。所以杜聰明要面對的，其實是一個經費不足、人力欠缺與設備殘破的臺大醫學院與附屬醫院體系<sup>3</sup>，這個院長並不好做。尤其是在與國府軍公人員的接觸過程中，留下很多不甚愉快的經驗<sup>4</sup>，更讓杜聰明的院長之路，走得十分艱辛。

在戰後之初，臺灣百廢待舉，醫學院與附屬醫院本身內部也有不少問題，等待解決，特別是因政權輪替所帶來的磨合陣痛，對任何事端稍有處理不當，即易形成政治風暴。一九四六年春天，一場因臺大附屬醫院內部的人事紛爭所導致的「罷診事件」，終使杜聰明陷入身任行政主管以來的空前危機中。

此次戰後初期史無前例的罷診事件，起因是日治時期的帝大附屬醫院臨床缺額相當少，剛畢業的醫學生，在臨床實習時是無薪水可支領的，等於是免費的臨床助教。不過一般實習醫生的生活，則可因爲到其他醫院去看診賺外快的機會，而稍獲紓解，且有時各醫院的醫師需求量頗大，科裡的講座教授甚至還會親自統籌安排門下的學生每週有固定的天數出外看診，以賺取足夠的生活費。不過，幾乎沒有人願意這樣過一生，絕大多數的醫學生都是在剛畢業時，在醫院實習個幾年，過渡期後即會自行開業，另創前程，因爲他們知道，待在以日人爲主的帝大附屬醫院再久，都不太可能有升任正式醫師的機會<sup>5</sup>。這種情形，到了戰後，起了微妙的變化。因爲多數日籍醫師皆被遣返回日本，臺大的兩個附屬醫院一時之間都出現大量的醫師缺額，許多原本在地方醫院服務的年輕醫師，都自願不計酬勞地返回母校醫院服務，其數約在百人左右。原本臺大首任校長羅宗洛在一九四五年底時曾有允諾，要儘快發給這些人「無俸聘書」，以使其可以名正言順在醫院看診。可是不知何故，事情延宕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卻依舊未見聘

<sup>3</sup> <臺大附屬醫院 維持甚感困難>，《中華日報》第3版，1946.6.22。

<sup>4</sup>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186~188。

<sup>5</sup> 楊玉齡、羅時成合著，《台灣蛇毒傳奇——台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臺北：天下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42~43。

書發下。這群青年醫師，在幾次跟校方溝通不成，感受到校方官僚作風與凡事推諉的惡劣態度，不願再苦苦等待，於是在三月十九日對校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前發出聘書（包括有薪與無薪），否則將罷診以示抗議<sup>6</sup>。據當時曾身歷其境的外科醫師林天祐說，當時的住院醫師，「薪水常常一兩個月領不到。有時，每半個月，借支一次，藉以勉強維持生活。因此，一切都在不安定中。偌大的醫院，好像在喘息中過日子。」<sup>7</sup>有給職的住院醫師如此，至於無給職或甚至連聘書都沒有的助理醫師，其內心的惶恐與不安，就更可想而知。臺大校方未能加以體諒，儘早解決，終於釀成這次的事端。

當時因正值羅宗洛返回大陸，臺大校務由教務長陳建功代理，另有掌實權的主任秘書周壽昌。面對這些醫師的要求，陳與周皆以權責不足、不便回應為由，消極應付，終於導致事情惡化，史上未有之臺大醫院罷診事件終於發生，而第二附屬醫院醫師為表示同舟一命之情義，亦自三月二十七日起，加入罷診的行列。不僅無薪無聘者罷診，連有薪有聘者，也響應加入罷診的陣容，形成一場臺灣醫療史上的空前危機。罷診事件爆發後，各界反應激烈，包括當時的臺北市長游彌堅、市參議員及臺灣省科學振興會（按：當時杜聰明為該會理事長）的理事施江南醫學博士及其他社會賢達與地方有力人士等，在三十日下午與醫院代表開會，希望儘速結束罷診，但醫院醫員們態度強硬，誓言不達目的絕不中止，雙方不歡而散<sup>8</sup>。為使訴求能夠更有效力，且免各界誤會，以為臺大醫員無理取鬧、惡性罷診，與臺大醫員有唇齒相依關係的臺大醫學院學生與基礎學教室人員，同時在四月一日，向外界發表聲明，表明其支持臺大醫員的立場，並且把問題提升到學術自由與大學民主化的層次。在臺大醫學院學生的聲明書中說，「吾等學生自光復後大學接收以來，每感大學當局之專制，反對學術無理解之態度，認為有高呼改革之必要」<sup>9</sup>。基礎學教室員則認為，大學當局如果對罷診事件「遷延解決，於事實上徒以障礙學生之教育及我同人醫學之研究而已，然既無視本醫學院我同人之眾意，故未有表現何誠意以解，次則我同人認為對於大學發展向上，似無熱心，因是我同人重申微愆，懇促大學當局猛省，速將該問題圓滿解決」<sup>10</sup>。面對醫學院與醫院如排山倒海般的批評聲浪，習於官僚作風的臺大校方，依然不動如山，臺北市長游彌堅在調解的過程中，曾建議陳建功代校長先發聘書，但他卻以正式關防尚未領到為由，要等待羅宗洛自大陸領到正式關防返臺後，再一併處理

<sup>6</sup> 左衽，〈為何要求無俸聘書〉，《民報》，第2版，1946.4.9。

<sup>7</sup> 林天祐，《象牙之塔春秋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74。

<sup>8</sup> 〈大學醫院風潮尚未解決 互不相讓反增困難 游市長奔走未見奏效〉，《民報》，第2版，1946.4.1。

<sup>9</sup> 〈要求大學當局反省 罷診事件再發展〉，《民報》，第2版，1946.4.2。

<sup>10</sup> 〈基礎學教室職員 亦提出決議書〉，《民報》，第2版，1946.4.2。



<sup>11</sup>。僵局鬧到四月九日羅宗洛自上海返回臺北後，才略見轉機。四月十日醫員代表們在施江南等有力人士的陪同下，前往拜訪羅宗洛，得其應允將在四月十一日先發下無薪聘書，至於有薪聘書等到行政院預算通過後，當即發下。醫員們得到善意回應後，決定於四月十一日起恢復看診<sup>12</sup>。拖延近三個禮拜、震撼臺灣社會視聽的臺大附屬醫院罷診事件，才算暫時告一段落。

此次罷診事件，羅校長回臺兩天即告解決，臺大代理校長卻可以遷延近二十天仍不肯設法積極處理。不僅徒增醫員們的不滿，更是完全無視病患就診的權益，其態度之敷衍與官僚作風，確實令人憤怒。官營的《臺灣新生報》在評論該事件時，也認為此事件原本為單純之請求，要求給薪委聘，只是求個工作與生活上的保障，並不過份，只是以罷診為手段，似有過當，但其實也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至於大學方面，代理校長以不便作主、有礙預算為由，其實也是在位者自保的考慮，從法理上來說，也沒有錯。問題可能是出在校方「答復時言語態度之間，或有忽略輕視對方要求的地方，而致引起反感。……有許多不成問題的事，釀成大事的，在起初往往是因了不相干言語的誤會與衝突。辦法雖是，而應付較差，或是使這事難以轉寰的原因吧。」<sup>13</sup>但是我們從醫學院的院生與基礎學教室員，發表聲明支持並趁此機會要求學術自由與大學民主化來看，問題的背後恐怕並不單純，醫員要求的保障與學生要求的民主自由，正是當時臺大校方令人感覺最欠缺的地方。這次的風波，應該只是國府接收臺灣高等教育後，長期諸多不當作為下的一種強力反彈，顯現的可能也只是高等教育問題冰山的一角吧！

臺大兩附屬醫院發生罷診風波時，杜聰明正擔任臺大醫學院長及第一附屬醫院長，可謂首當其衝。他在此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及此事對他與國府統治階層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值得深入觀察。據當時媒體的報導來看，杜聰明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為，極可能引起當政者的不滿。杜聰明在此次罷診事件中，一開始，醫員們的意見，當然是會透過杜聰明來表達，杜顯然也同意醫員們這樣的要求，因此代為向上提議，但為什麼是正好選在主事的羅宗洛校長不在臺灣的時間，就費人疑猜。得不到陳建功代理校長的正面回應後，罷診成真，而且兩個附屬醫院一起響應，杜聰明顯然並未積極加以阻止，而是採取自然放任的態度，藉機引起社會輿論的注意，以求加諸校方壓力<sup>14</sup>。因此罷診不到兩週後，杜又向校方催發聘書，陳建功仍不願負其責，全推給羅宗洛，早已與醫員站在同一陣線的

<sup>11</sup> <待羅校長歸校後才可辦理委任事宜 對罷診問題某當局者談>，《民報》，第2版，1946.4.4.

<sup>12</sup> <台大附屬醫院今天看診 應予學術自由研究 羅校長歸台急速解決>，《民報》，第2版，1946.4.11.

<sup>13</sup> <社論：臺大附屬醫院罷診平議>，《臺灣新生報》，第2版，1946.4.5.

<sup>14</sup> <待羅校長歸校後才可辦理委任事宜 對罷診問題某當局者談>，《民報》，第2版，1946.4.4.

杜聰明，當然不能接受這樣敷衍塞責的答案。因此對於校方多次希望他勸阻醫員停止罷診的要求，會有如何之反應，可想而知。在杜聰明想來，這些要求本是羅宗洛接掌臺大之初所答應，也是他帶頭為醫員福利與保障所作的爭取，如今豈可翻臉不認帳？因此在一再調解雙方紛爭無效後，身為醫學院與第一附屬醫院行政主管的杜聰明，乾脆撒手不管，「置身事外」，一切等羅宗洛自行回臺收拾殘局。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說杜聰明在幕後主導這一次的臺大附屬醫院罷診事件，但從兩院罷診、醫學院學生與基礎學教室員同時發表聲明支持醫院醫員，並譴責校方行政官僚的後續發展來看，當時醫員與學生們公認的大家長杜聰明，至少應該是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場，希望藉此一事件改變臺大校方某些行政作風，事實上杜也是在向校方展現他的廣泛影響力。待事件落幕後，依照國府官僚的行事作風，政治清算恐怕在所難免，三月鬧罷診，五月時羅宗洛校長即黯然離職。不過，可能是基於人事和諧且不願再惹起類似的風波，引起社會側目，甚至質疑國府的統治能力，當局只在隔年一月悄悄免去杜聰明的第一附屬醫院長兼職，而以陳儀的親信陳禮節接任<sup>15</sup>。雖是暫時保住醫學院長之職，但其中的政治懲處意味，不言可喻。但杜聰明並不能久安其位，被免去醫院長後不久，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他果然連醫學院長的位子也一起失去，甚至差一點連性命也不保。

在日治時期，杜聰明為免惹禍，雖與政治異議人士保持來往，但他卻從不主動參與政治抗議活動，保持其「政治是非不沾鍋」的身份，而得以同時與日本官憲維持和諧的關係。不過，這對年輕時曾經企圖謀殺袁世凱、加入中華革命黨為黨員<sup>16</sup>的杜聰明而言，日治時期的不參與政治運動，似乎只是體認大環境不允許之下的明哲保身之舉，在杜聰明的內心深處，仍有著一股藉政治以建設臺灣的意念。這個企圖心，在臺灣光復之後，開始逐漸展現出來。

先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他被臺北市長黃朝琴聘為臺北市市政建設委員會委員，旋即當選該委員會的議長<sup>17</sup>。這樣的政治參與，顯然是因為他的聲望，而非他的專業。出身臺南佳里的吳新榮醫師，在一九四六年秋天北上開會，見到了身任臺北市建設委員的杜聰明，他對杜的從政就不抱樂觀期待謂：

杜聰明是個身材矮小行動銳敏的學究，他在醫學上的成就即使日人也不敢看輕，他在光復後被任為政府的委員。這雖是表現科學者在每時代都是被

<sup>15</sup> 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編輯委員會，《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中)光復後(一九四五—一九九七)》，(臺北：臺灣大學醫學院，1998)，頁91。

<sup>16</sup> 詳參杜聰明，《回憶錄》，頁63~65、80。

<sup>17</sup> 杜聰明，〈履歷書〉，《杜聰明言論集 第2輯》，(高雄：私立高雄醫學院，1964)，頁9。

重視的，但拿一個不知世事的專科學者，出來搞那樣複雜的政治問題，夢鶴（按：吳新榮自稱）想不一定是對科學的尊重<sup>18</sup>。

稱「開臺第一博士」為「學究」，而且對杜氏以政治外行人從政，提出如此警語，吳新榮可能因與杜之間並無師友關係（按：吳是東京醫專畢業者），故敢作如斯大膽之剖析。至於杜聰明身邊的學生與朋友，則似無人出面勸阻杜從政，在傳統「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下，杜聰明就在吳新榮的不看好中，逐步走上政治之路。當臺北市建設委員只是小試啼聲，一九四六年九月他更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參與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成為少數能到南京直接參與中央政治的臺灣人代表<sup>19</sup>。不過，這樣突如其來的政治經歷，並未對杜聰明帶來太多的幸運，當面臨像「二二八」這樣的臺灣人政治大災難時，杜聰明也同樣難逃一劫。

醫學研究者出身的杜聰明，其實與當時多數對國府統治懷有不切實際幻想的臺灣社會精英一樣，不知道國民黨統治之酷烈。幸虧他還沒有像某些自認沒有做什麼壞事應該不會被怎樣的臺灣人那般天真，被國府人員誘去自投羅網，懂得四處躲藏以保性命安全，最後終能全身而退。可說雖無先見之明的政治智慧，但至少還有後知後覺的自知之明<sup>20</sup>。且在「二二八」期間，由於杜聰明的堅持，讓原本想佔領醫學院基礎學教室作臨時兵營的國軍部隊，最後同意只佔領學生宿舍，而能保住多數實驗儀器未遭破壞<sup>21</sup>，讓「二二八」之後的研究工作還能持續不輟，算是對臺大醫學院最大的貢獻。

「二二八」之後的杜聰明，就如同臺灣其他醫界人士一般，對於政治的熱情，迅速降溫。雖然除了身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外，杜還擁有一些民間團體的榮譽頭銜，但他顯然已自「二二八」的經驗中學到教訓，知道國府統治下的政治，非如他所想像那般單純，此後就未再參加重大的政治選舉，而將心力放在經營他所熟悉的醫學教育上。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臺大第三任校長莊長恭再度禮聘杜聰明為醫學院院長，鳳還巢之後的杜聰明，相當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大力發展臺大醫學院的教務工作。杜聰明此番回任臺大醫學院長時的身份，算是比較特殊，雖然他只是臺大校長之下的醫學院院長，但因他還同時身兼臺灣省政府委員，而臺大的經費來自省府的預算，在行政層級上，他可以監督臺大整體校務。所以在某些作為上，也顯得比較強勢，而這也為他與政治層峰之間的關係，帶來某些不良的影響。

<sup>18</sup> 吳新榮，《震瀛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204。

<sup>19</sup> 《臺灣新生報》，第5版，1946.9.7。

<sup>20</sup> 有關杜聰明在二二八事件時期的行止，請參杜聰明，《回憶錄》，頁198-200。

<sup>21</sup> 杜聰明，《回憶錄》，頁192。

其中較為顯著的兩次事端，是杜聰明事後經常津津樂道、引以為豪，但在當年卻可能是他與衛政高層結怨的導火線。一是政府遷臺後，因為經費缺乏，曾任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長、當時出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長的中國醫界要人劉瑞恆<sup>22</sup>，曾建議將臺大醫學院靠近仁愛路邊的校地出售，以補充建校經費。但是杜聰明強力反對，認為經費不足可在一定期限向上請求，土地一旦出售便難以買回，不同意這樣的意見<sup>23</sup>。劉瑞恆乃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戰前在大陸時期曾任北京最負盛名的協和醫院院長、協和醫學院院長及衛生部長、軍醫署長等要職，戰後更出任美國醫藥援華會（ABMAC）主任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衛生委員會主任，掌控醫藥物資的分配，深受蔣介石政權與美國政府的信任。來臺後雖未在國府任正式職位，但在醫衛領域的影響力與發言份量，國府內部恐無人能出其右。蔣介石在大陸失勢來臺後，劉瑞恆也轉進臺灣，出任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與美國醫藥援華會副會長兼駐華代表。除了繼續與黨政高層保有密切關係外，劉與當時新任的臺大校長傅斯年之間，也相當投合，傅斯年日後許多改革臺大醫學院與附屬醫院的計劃構想，可能都是出自劉瑞恆的建議。而當時紅十字會的辦公地點，劉瑞恆看中了臺大醫學院一個露天操場旁的破舊房屋，透過傅斯年來向杜聰明商借此地，他就在這裡一直工作到他一九五九年離臺赴美治病為止<sup>24</sup>。算來，劉瑞恆和紅十字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杜聰明的「房客」，所謂建議杜聰明賣校地，當然是發生在這段期間，但不知是否是要杜聰明將校地賣給紅十字會就不得而知。杜聰明敢拒絕這位許多遷臺大陸醫界人士口中尊稱的「劉部長」的建議，從身為臺大人的立場與臺大醫學院日後的發展來看，算是頗有遠見的堅持，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裏，對他日後在臺大的前途，似乎不見得是件好事。

另外一次是當時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JCRR），要向臺大醫學院借地建辦公大樓，並允諾將來反攻大陸後，原建物將無條件贈送給臺大醫學院。當時臺大醫學院內多數人都認為在物資艱鉅的年代，這是相當優厚的條件，讚成要答應農復會的要求，惟獨杜聰明反對，農復會只好另選其他地點建樓<sup>25</sup>。在那個反共復國高調被唱得漫天價響的年代，任何事只要是跟反攻大陸扯上關係，幾乎無不水到渠成，未料農復會竟在杜聰明這裏踢到鐵板。農復會在當時是臺美合作的經濟與衛生機構，與美援會同時擔任協助國民黨政府立足臺灣的重要地位，即使蔣介石也要敬畏三分。杜聰明此番勇於拒絕，即使不是預料到反攻大

<sup>22</sup> 有關劉瑞恆的生平經歷，請參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正文前之「劉公瑞恆學經歷簡表」。

<sup>23</sup> 杜聰明，《回憶錄》，頁190~191。

<sup>24</sup> 葉曙，〈劉瑞恆先生與臺大醫院〉，收入劉似錦編：《劉瑞恆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頁128~129。

<sup>25</sup> 杜聰明，《回憶錄》，頁191。



陸只是遙遙無期的夢想，至少也為臺大醫學院校地的完整發展，又打了一次漂亮的勝仗。

除了在硬體的土地問題上屢次拒絕黨政高層及美國方面的要求外，杜聰明對於臺大醫學院校務上的發展，也自有其定見，其中拒絕與遷臺的國防醫學院合併，可以說是他為母校所做影響最為深遠的決定。杜晚年憶及此事，還相當滿意於自己的抉擇<sup>26</sup>。

有關這一段國防醫學院尋求與臺大醫學院合併的經過，關係到兩校日後在臺灣的發展，以及醫學界「臺大體系」與「國防體系」的形成<sup>27</sup>，其在臺灣醫學教育史上的影響力，不能不細究。

國防醫學院其實早在大陸時期，就是一個歷經「合併」而來的學校。原來是抗戰勝利後，國府為求改造軍醫體系，乃議將主導軍中醫藥衛生事務的「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與主導軍中醫衛教育的「軍醫學校」合併為一校，主其事者乃時任軍醫署長的林可勝，但軍醫學校教育長張建則持反對意見。張建反對的理由是，軍醫學校前身是建於一九〇二年的北洋軍醫學堂，有悠久之歷史傳統，而所謂陸軍衛生人員訓練所，只不過是戰時體制下一個臨時簡單訓練衛生勤務人員的單位，根本稱不上是個正規的學校。如此合併將使歷史悠久的軍醫學校消失、非正規體制的訓練所卻反而一躍而為正式學校，其間孰得孰失一目瞭然。當時以參謀總長陳誠為首的一批軍頭，力挺林可勝的併校計劃，廣東地區的一批將軍則支持張建，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是由陳誠以「你們誰要打倒林可勝先生，先得打倒我，打不倒我，就打不倒林先生」的重話，強勢運作通過合併案。合併以後的新學校就是「國防醫學院」，林可勝理所當然出任第一任院長，張建任副院長，院址遷至上海江灣<sup>28</sup>。

林可勝原是南洋華僑，留學英國愛丁堡習醫，曾任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學教

<sup>26</sup> 杜聰明，《回憶錄》，頁 191~192。

<sup>27</sup> 醫界對兩大體系的不同認同，源自於二二八事件後的省籍情結及國府遷臺後的族群生存競爭，多數對政治冷漠的臺籍醫師，選擇以醫術及辦學校的方式，展現他們在專業上的能力，如高醫、北醫、中山醫的創辦等，均是臺籍醫界人士展現社會影響力的表現，而其創辦者都是出自臺大醫學院體系；反觀以外省人為主體並擁有政府資源作後盾的國防醫學院，以及日後的陽明醫學院，則與本省人所辦之學校，在立校宗旨與組成份子上，有很大的差異，而不易得到臺籍人士的認同。時至今日，結合各自發展出來的醫院系統，此兩大體系之間的認同鴻溝日益加深，其相互間的競爭當然有助提升臺灣的醫衛水準，但也易因不同的認同而在政治立場上，發生磨擦與衝突。有關這一部份的研究，學界很少觸及，簡單的討論則可見張家榮，〈台灣當代生殖科技的建構——以科學社群與身體論述為觀察〉，（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頁 18~21。

<sup>28</sup> 有關這一段國防醫學院在大陸時期的併校糾紛，其詳可參張朋園訪問、羅久蓉記錄，《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76~77。

授，是該校的第一位中國人教授，本身英文能力極佳。抗戰時期，從淪陷區的北京市逃出，出任中國紅十字會總幹事，籌組救護總隊，自任總隊長，並冒險在中國各地協助軍方建立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主持後方與前線的軍事救療工作，貢獻厥偉，與黨政軍高層的關係極好<sup>29</sup>。由前述陳誠不惜當眾放話力挺，可見一般。但是國防醫學院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後，遷校來臺之初，師生幾乎無處可以棲身，在陳誠的幫忙下，暫時被安置在臺北市水源地的原日本砲兵連隊營區，教室不夠用，學生只好露天上課，一間大禮堂權充學生宿舍，教職員眷屬還得擠在帳篷內過生活。後來還多虧臺大出借土林的血清實驗室與部份女生宿舍，才稍解愁困。另外在師資方面，也是嚴重不足，得靠臺大醫學院的支援<sup>30</sup>。

從這樣的歷史背景來分析，國防醫學院之所以會尋求與臺大醫學院合併，是有其脈絡可循的。不論從遷臺後發展的便利、師資經費與儀器設備等的取得與對學生的生活照顧等來看，與當時全臺唯一的臺大醫學院合併，無疑是繼在大陸時期與軍醫學校合併後的又一有效校務發展策略，成本最低而效益最大。但是就杜聰明而言，無論國防醫學院主事者的主觀意願如何，一旦合併，臺大可能要面臨多方面的問題，一則有半世紀以上歷史的臺大醫學院，可能就在此在臺灣醫學史上消失，該如何向廣大臺大醫學院師生交待？再則國防醫學院屬軍醫體系，雖有軍方經費支持，但是其教育的宗旨、目的與訓練的方法等，傾向於以培養軍中醫療體系的實用人材為主，與向來以培植醫界領袖與研究精英的臺大醫學院的教育目標，實大異其趣。一旦合併，在教學實習與師生管理上，必然橫生很多磨擦，這該如何解決？還有就是杜在上述引文中所擔憂的，臺大醫學院與附設醫院的教師與各科主任等，均是戰後遞補日本人遺缺的年輕臺灣醫界人士，社會歷練不足，若遽爾合併，難保不會被來自大陸的國防醫學院老教授群所壓制，反而使臺大人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至於有人懷疑杜是不是擔心合併後，他只能像張建一樣當個副院長，喪失臺灣醫界龍頭的寶座，就根本是以小人之心度人了。

在拒絕與國防醫學院合併這一事件上，經杜聰明幽默婉拒之後，並無後續發展。但因林可勝背後有軍方撐腰，特別是一向力挺林的陳誠時任臺灣省主席，此事恐難免使杜聰明與政治高層之間再次產生嫌隙，為杜個人往後在臺大醫學院的行政生涯，埋下更多的變數。

### 三、傅斯年對臺大醫（學）院的整頓與杜聰明

<sup>29</sup> 張朋園訪問、羅久蓉記錄，《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頁 98~104。

<sup>30</sup> 有關國防醫學院初遷臺時的困頓與發展過程，請詳參熊秉真訪問、鄭麗榕記錄，《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 54~55、117~118。

傅斯年校長的任期雖短(1949.1.~1950.12.)，但他可說是戰後早期四任臺大校長中，學術聲望最隆、知名度也最高的一位。不只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與史學研究方法上，備受學術界敬重，主持中研院史語所期間，更證明他是位既能治學又能辦事的人才。而他來臺時的內外環境均不佳，在中國大陸，國共內戰正酣，江山隨時有為共產黨所奪的危機<sup>31</sup>；在臺灣本島，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傷痛尚未平復，很多建設都百廢待舉；而在臺大內部，諸多中國學制與傳統日本學制不能軋合的磨擦，都還沒能完全解決。所以各方對於傅斯年肯以德高望重之軀，來臺接此苦差，莫不懷抱極大的期待，希望臺大能在他手中脫胎換骨。傅斯年對於臺大校長一職，也深自期許，抵臺之初，即對外宣稱，要以開誠佈公的態度辦學，務使臺大在他主持半年內，即將學術水準提升到全國大學最高最好的程度<sup>32</sup>。

傅斯年雖是學者出身，但也深明權力競逐之道，為推動他所謂的改革，一上任即將臺大三長，全數換成他可信任的外省籍人士，其中教務長錢思亮，日後接替他成為第五任臺大校長。據統計，當時整個臺大行政體系中的成員，有超過四分之三是傅斯年任校長後所新聘<sup>33</sup>，這些人自然較能效忠於他。將整個臺大行政體系做了一次大換血的用意，就是希望自己在推動校務改革時，不致遭受無謂的抵抗。不過，傅斯年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主持臺大校慶時，仍有感而發地說，他主持校務一年多來，「最可喜的是學生力求進步，最可惱的是臺大附屬醫院」<sup>34</sup>，他更曾對附屬醫院的魏火曜院長說，「在臺大的時間，一半放在醫院的事情上，因為麻煩最多」<sup>35</sup>。

臺大附屬醫院之所以讓傅斯年感到可惱，主要是許多因歷史包袱而遺下的弊端。從各方面的紀錄綜合來看，當時的臺大醫院，大致存在著幾大問題，一是管理不善、設備老舊，二是部份醫護人員品德操守不佳，三是族群之間的醫療糾紛不斷。據被傅斯年引為改革臺大醫院與醫學院主要助手的病理學教授葉曙說，「改革之前的臺大醫院，完全沿用日本制度」，可是戰後日本教授因為不再有兼行政管理的權威，其他的中國籍醫師則是不知如何管理，於是本來在日本運作良好的

<sup>31</sup> 傅斯年於1949年1月20日來臺，隔天蔣介石即宣佈引退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國共鬥爭形勢大逆轉，傅斯年出長臺大，可能也是蔣介石預留後路的一步棋。參〈弭戰銷兵解民倒懸 總統昨宣佈引退 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傳政委張治中可能繼組新閣〉，《臺灣新生報》，第2版，1949.1.22。

<sup>32</sup> 〈傅斯年昨日抵臺 陳主席蒞機場歡迎 傅氏談將提高臺大學術水準〉，《臺灣新生報》，第5版，1949.1.20。

<sup>33</sup> 曾士榮，〈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一九四五~五〇）〉，頁153~154。

<sup>34</sup> 〈臺大校慶傅斯年的感想 最可喜的是學生力求進步 最可惱的是臺大附屬醫院〉，《臺灣新生報》，第7版，1950.11.15。

<sup>35</sup>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39。

「大學病院」制度，在戰後的臺大醫院裏，全走了樣<sup>36</sup>。而面對臺大醫院的諸多弊端，曾身任兩院主管的杜聰明，卻未能有效解決，葉曙甚至曾痛批杜聰明對於醫生護士公然集體作弊，根本「視若無睹」<sup>37</sup>。

臺大醫院的問題，關乎全臺民眾健康，自然會引來輿論高度注意，據葉曙形容，當時輿論對臺大醫院的批判之猛烈，簡直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地步<sup>38</sup>。誠然，臺大醫院內部問題很多，但平心而論這並非全是醫院本身的問題，整個臺大或公部門的制度與行政效率，也要負相當的責任，但媒體卻「有志一同」地將責任全推給臺大醫院。令人起疑的是，自二二八事件之後，幾乎已全為國民黨政權掌控的報紙媒體，竟會「不約而同」地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即傅斯年準備大舉改革臺大醫院之前幾個月，以「萬箭齊發」的方式，群起攻擊臺大醫院的種種缺失，其聲勢之浩大，很難想像這是在白色恐怖時代，對於公部門的行政得失一向噤聲不語的媒體，所應呈現的自然現象，幕後是否有特定人士為特定目的操控，實在值得推敲。而且，當時一向持重的《中央日報》，竟也加入了責罵臺大醫院的行列，其象徵意義是什麼？《中央日報》身為國民黨黨報，其言論代表的當然是黨政系統的立場，加入批判臺大醫院的行列，顯示黨政高層對於臺大醫院的現況，也已漸感不耐，這是國民黨政權的明確表態，頗有給予傅斯年改革正當性的味道。難怪魏火曜對此會有感而發地說，「聽說傅校長要改革臺大醫院，所以容許記者批評，然後再從事改革」<sup>39</sup>。

在黨營《中央日報》帶頭批判的「輿論壓力」之下，向來予人溫文儒雅印象的傅斯年校長，「不得不」順應輿情，開始推動他對臺大醫院與醫學院的一連串改革與整頓。當時傅斯年雖然本身對於臺大醫（學）院的改革方向，可能早有定見<sup>40</sup>，但為求慎重其事，他仍然找來臺大醫學院長杜聰明、病理學教授葉曙、附屬醫院長魏火曜、以及院外醫界大老劉瑞恆等人，組成一個非正式的改革小組。他們經常聚在一起餐敘或開會，討論臺大醫（學）院今後該何去何從。其所形成的結論，則交付臺大的校務會議通過，成為正式的政策。其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質言之可分為幾項，一是要求醫（學）院所有各科都要把現有教員或醫師淘汰百分之五，以逼使不努力認真工作的人自動放棄原職。二是徹底廢除醫學院講座

<sup>36</sup> 葉曙，《病理卅三年》，（臺北：傳記為學出版社，1982），頁152~153。

<sup>37</sup> 葉曙，〈病理科主任卸任以後〉，收入氏著，《閒話臺大四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頁90。

<sup>38</sup> 葉曙，《病理卅三年》，頁151~152。

<sup>39</sup>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38~39。

<sup>40</sup> 傅斯年本身留德，對德國醫界應該有些瞭解，另據魏火曜說，傅在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時，該校也有不少德國籍教授，加上他曾因高血壓赴美就醫兩年，對於美國醫院的管理情形，略知一二，因此在進行臺大醫院的改革前，他可已有些自己的看法。詳參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39。



制，並將附屬醫院原本的三個內科、二個外科予以合併，各置主任一人，與臺大醫學院各科系一致，實施徹底的主任制。三是建立住院醫師合同制，規定各科應有住院醫師的人數，廢止臨床各科的無薪給助教名稱<sup>41</sup>。另外也要求將醫學院必修的外國語，由德、日語改爲英語，要求臺大醫院的醫護人員儘速學會國語，並將「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改稱「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由校長直接指揮。

這一連串改革的主要脈絡，簡單地說就是把原有的德、日式架構改爲英、美式體制，或者是說「去日本化／中國化（世界化、英美化）」，背後是否有美國方面的壓力，不得而知，但我們可要特別注意唯一自院外加入改革臺大醫（學）院的劉瑞恆的角色。據研究，國府遷臺後，在衛生行政事務的推動上，仰賴美國以及聯合國援助者甚多，其相關組織包括美國援外總署臺灣分署衛生組、美國醫藥援華會、Rockefeller 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兒童緊急救濟基金會（UNICEF）、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衛生委員會以及臺美雙方合組的中國農業復興委員會鄉村衛生組等<sup>42</sup>。爲了協調這些不同的美援單位，在美方的要求下，一九五一年在行政院內政部成立了一個「衛生設計聯繫委員會」，作爲雙方的協調單位，由劉瑞恆出任主任委員。當時的內政部衛生司並無實權，負責執行的省政府衛生處，因經費有三分之一甚至過半，控在美援單位手上，所以實際上可說只是衛生設計聯繫委員會與農復會鄉村衛生組的配合機關而已。真正擁有最高決策主控權的，正是不歸屬政府正式部門的衛生設計聯繫委員會。該會的組成是由臺美雙方各自派員參與<sup>43</sup>，名義上只是負責協調聯繫<sup>44</sup>，但實際上卻是美方清楚傳達訊息，並將其貫徹於臺灣衛生施政的重要窗口，與農復會鄉村衛生組及省衛生處大致形成一個「決策協調／規劃審查／實際執行」的權力結構關係，儼然是當時中央衛生決策的中心所在，其權力層級遠遠超過負責配合執行的省衛生處及無實權的內政部衛生司。這樣一個特殊的機構，由出身哈佛、協和，又曾任國府衛生首長的劉瑞恆，以美國醫藥援華會副會長暨駐華代表的身份，出任主任委員，劉瑞恆在當時臺美雙方醫藥衛生事務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雖然劉瑞恆出掌衛生設計聯繫委員會，是傅斯年開始改革臺大後的事，但對自一九四九年五月遷臺後需求美援孔急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劉瑞恆幾乎就是美方在臺的代表，劉的意見自然反應出美方的意志。誠如對劉瑞恆極其推崇的葉曙所言，劉瑞恆「雖不擔任政府

<sup>41</sup> 有關傅斯年的這一系列改革措施，可詳參葉曙，《病理卅三年》，頁 154~155。

<sup>42</sup> 有關這些組織的運作概況，請詳參黃文弘，〈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臺灣醫學典範轉移的系譜溯源〉，（臺北：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55。

<sup>43</sup> 美方參與的單位有援外總署駐華分署衛生組、美軍顧問團、美國醫藥援華會、以及雙邊組織的農復會，臺方的代表則有內政部衛生司、省衛生處、臺大醫學院、國防醫學院與軍醫署的代表等。見黃文弘，〈政經框架、典範碰撞與知識位移——臺灣醫學典範轉移的系譜溯源〉，頁 155。

<sup>44</sup> 據杜聰明言，該會「大概每週星期六開會一次，其目的爲討論在臺灣所要解決之醫事衛生重要問題，了解各自擔任部份，及防止重複及偏見，相互聯繫，加強合作是也。」見杜聰明，〈臺灣醫學會第 45 屆總會開會致詞：光復後臺灣醫學之進展〉，《杜聰明言論集 第 1 輯》，頁 552。

要職，但對於衛生行政和醫學教育，隨時都在幕後指導，而負責衛生行政與醫學教育的人，亦莫不樂於聽從。」<sup>45</sup>其在醫衛界廣泛的影響力，可見一般。臺大醫（學）院的經費也對美援多所仰賴，所以如果說傅斯年的改革，是基於他個人或國府的自主意識，完全沒有美方的影響，恐怕很難說服人。這是國家財政上的現實壓力，不是傅斯年個人取捨的問題。

傅斯年這一連串「去德日制、採英美制」的改革措施，顯然逼使向來崇尚德日制的醫學院長杜聰明，處於一個相當困窘的境地。雖然葉曙宣稱，傅斯年的這些改革醫學院與附屬醫院的計劃，「幸獲杜聰明先生和魏火曜先生的合作」<sup>46</sup>，而得以順利推行。不過，這如果不是葉曙一廂情願的說法，也是杜聰明在抗拒無力之後，莫可奈何而接受的結果，絕不能說是杜聰明願意真誠與傅斯年配合或合作。因為這些改革，不只是革掉臺大醫（學）院長年以來的德日傳統，也革掉了杜聰明數十年來奉若圭臬的德日式醫學理想，及他原先所擁有的權力。以他不服輸的個性，是不可能就此任人宰割的<sup>47</sup>。在傅斯年的改革方案中，以臺大附屬醫院的改制，最是觸動杜聰明的痛處，曾引來杜聰明方面強烈的反彈，雙方有一番激烈的攻防戰。

臺大附屬醫院自日治時期以來，即以所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的型態存在，為醫學院的下屬單位，在日式講座制之設計下，醫學院與附屬醫院本為一體，講座教授即醫院各科教授，醫院各科由講座教授統管並直接隸屬於醫學院指揮，此種教學研究領導臨床診療的體制，在臺大已行之有年。杜聰明當然堅定認為，以臺大醫學院自日治時期以來重研究的傳統而言，此一體制不宜輕言改變。不過傅斯年則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強調，既是醫院即應以臨床診療為本，不應與醫學院的教學研究混為一談，以免影響病患的權益，企圖要劃清醫學院與醫院間的界線，使二者各司其本職。也就是說，杜聰明著重的是臺大醫院的日式傳統，此一傳統當然有其優點，但其缺點卻也如前文所述，葉曙及一些報紙媒體所批評的那般，在戰後的臺大醫院展現。即使曾身任院長的杜聰明，在其任內也沒能提出解決之道，難怪對手會以此相批。但是傅斯年這項改革，當然也不免會讓人聯想成是校長要奪醫學院長之權，因為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重大決策，需由醫學院做最後定奪，一旦改成了臺大附設醫院之後，就直接由校長指揮，醫學院就

<sup>45</sup> 葉曙，《病理卅三年》，頁 156。

<sup>46</sup> 葉曙，《病理卅三年》，頁 154。

<sup>47</sup> 杜聰明在他傳世的《回憶錄》中，對於當年如何與傅斯年「合作」推動臺大醫（學）院的改革之事，幾乎隻字未不提，可以看出他對傅氏這些改革的基本態度，絕非出於他的自願，只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為，因此《回憶錄》中也盡量不觸及這段不愉快的回憶。

管不到醫院的事務，等於醫學院長的職權被削去了一大半<sup>48</sup>，難怪杜聰明要反對這種要求他「自廢武功」式的改制。

就在傅斯年與杜聰明雙方各有堅持而爭議不下之際，為免改革進程受到阻礙，傅斯年決定訴諸校務會議表決，將臺大醫院的定位法制化。除了訂出〈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組織章程〉，他自己並親擬該章程的草案說明，作為說帖，企圖說服與會的代表爭取支持，並將杜聰明一派的反對聲浪，消彌於無形。傅斯年在章程草案說明中強調，臺大醫院雖然是大學教學醫院，但是，「因本大學醫院在臺灣省有其特殊地位，故不能不于教學醫院一任務之外，另負一重大之任務，即臺灣省醫療事務之領導地位也。」<sup>49</sup>正因為在現實環境下，臺大醫院不宜成為純粹的教學醫院，因此臺大醫院就成為具備教學醫院與一般醫院的雙層性質，他認為既是如此，醫院應有另一組織，以有別於傳統上直接隸屬於醫學院的架構。因此他要提出此一章程，明定新的臺大醫院地位與任務。為免遭人「奪權」的口實，傅斯年原本希望在臺大醫院設立「評議委員會」，作為主導醫院的組織，「庶幾可得各方集思廣益合作推進之效」，但是「又恐此項設置剝奪校務會議之權，且可能在中國現行制度上有若干行不通之處」，因此最後還是將醫院回歸由校務會議與校長直接指揮，實權仍舊回歸校長。而對於杜聰明一派所反對的住院醫師制度與取消「無給助教」，傅斯年則以「世界潮流」本是如此，且即使在日本也不再堅持舊傳統，作為對「若干人士」反對的強力回應<sup>50</sup>。在草案說明書的最後，傅斯年強調，「凡因人而設之制度，如後來人事上已與設制時大不相同，即無存在之理，一切制度應合理化。」

打著改革旗號的人，往往會將反對的一方，歸為「抱殘守缺」、「食古不化」的頑固派，而藉由現有弊端的呈現，將自身的改革主張合理化甚至神聖化。傅斯年對臺大醫院體制所欲進行的改革，在社會輿論的推波助瀾下，展現了其「合理化」的一面。但是這樣的改革，直接衝擊舊有體制，一方面將醫學院與醫院之間的財務互通的經濟基礎破壞掉，使醫學院不能再靠醫院的收入來補貼預算的不足<sup>51</sup>。另一方面醫院自院長以下的人事任免權，也由醫學院長繳回校長手中<sup>52</sup>。行之

<sup>48</sup> 從附屬醫院改成附設醫院，是否涉及權力分配與財務結構的問題，臺大醫院內部有不同的看法，如李鎮源就這麼認為，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如另一位臺大醫學院教授杜詩綿就認為，將附屬醫院改成附設醫院，只是合乎中國人的用字習慣，與組織系統或財務結構，無必然關係。不過，筆者以為杜詩綿顯然小看了改制後的權力關係變化的內涵。詳參楊思標等編，《楓城四十年》，頁55。

<sup>49</sup> 傅斯年，〈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組織章程草案說明〉，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六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240。

<sup>50</sup> 傅斯年，〈臺灣大學附屬醫院組織章程草案說明〉，頁241~242。

<sup>51</sup> 原本臺大醫院需補貼大學與醫學院經費的不足，但在傅斯年到任後不久，歷經幾次的磋商後即已停止。參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傅斯年全集》，第六冊，頁269。

有年的講座教授兼醫院各科主任的既有權力受剝奪，某些年輕醫師對於住院醫師須留院二十四小時的新制度，也感到無所適從。身為醫學院長的杜聰明及任教授的教員，所受衝擊自然最大。但這樣的新體制，自然也不乏支持者，如醫院院長得以不再受醫學院院長之箝制，而在新的醫院「主任制」取代講座制之後，主任制下一科之內可以同時有好幾個教授的名額，對長期在醫院備受壓抑的中高階醫師而言，毋寧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所以他們當然樂於接受傅斯年的改革方案。在醫學院與醫院各派人馬各有利益考量的情況下，內部意見不能一致，致遭改革派輕易擊敗，〈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組織章程〉在校務會議獲得通過，自一九五〇年七月中旬開始實施。不過，初期的成效並不徹底，反彈聲浪依舊不小，如建立護理部後，雖請來留學加拿大的護理碩士陳翠玉出長護理部，但對向來眼中只有護士長的護士及經常把護士當雜工差使的醫師而言，都不太能適應而處處消極反抗<sup>53</sup>。許多年輕醫師也因在三級住院醫師制度實施後生存困難，而出國留學或離開臺大醫院到美國當外籍醫師，意外造成一股前所未有的留美風潮<sup>54</sup>。傅斯年自己也坦承，新制度的實施只是個「開始」而已，很多地方並不能立刻照章程進行，而他認為那是「臺大惰性」的一般現象所使然，讓他深感難言之痛<sup>55</sup>。

爲了改善因杜聰明等傳統保守勢力對臺大醫院改革的反彈，所導致的改革緩慢現象，傅斯年勢必得有其他的反制策略。雖然他可以其校長的身份，在臺大內規中壓制對方的意見，但臺大醫院到底在臺灣社會具有其超越一般醫院的廣泛影響力，欲求徹底拔除保守勢力的最佳辦法，仍是得訴諸社會輿論，讓整個社會認同他的改革，具有不能不爲的正當性。如此方可確保其改革成果不致在日後人亡政息，又讓保守勢力有反撲的機會。但這不能貿然行事，需等候適當的時機，或足以成其事的偶發事件的出現。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一名任職監察院閩臺行署的警長劉希聖，因肺病在臺大醫院住院期間自縊身亡，隔日《中央日報》披露此一消息。因事關監察院聲譽，院方因此決定進行調查控告，事態漸顯嚴重。雖然臺大醫院的魏火曜院長，隨即於新聞見報當天，去函《中央日報》說明醫院方面的立場與處理過程，強調醫院方面並無過失<sup>56</sup>。但是次日《中央日報》又刊出死者侄兒出面指控的新聞，

<sup>52</sup> 新章程中明訂：「(醫)院長商同醫學院院長秉承校長綜理院務」、「在醫院之醫學院教授、副教授、講師及主治醫師，均由醫院院長提請校長聘任之」、「三級住院醫師均由醫院院長提請校長任用之」。

<sup>53</sup> 李錦容，《臺灣女英雄陳翠玉》，(臺北：前衛出版社，2003)，頁38-44。

<sup>54</sup> 楊思標等編，《楓城四十年》，頁70。

<sup>55</sup> 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頁281。

<sup>56</sup> 〈臺大醫院肺病患者 劉希聖貧病自縊 監院行署決追查控告 臺大醫院函述經過〉，《中央日報》第5版，1950.10.12。



說其叔死因其實是由於無力繳付醫藥費，致受醫院的醫護人員嘲諷及不用心治療而尋短<sup>57</sup>。平日即已對臺大醫院多所責難的各大報，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個可以大加撻伐的機會，一時之間臺大醫院又成眾矢之的。不過，黨營的《中央日報》的態度，才最值得注意。因為連續的新聞見報，代表黨政當局，對於臺大醫院的問題，也已到不能坐視的地步。而這次偶發的社會新聞，倒意外地給了傅斯年一次出手徹底殲滅反醫院改革勢力的大好機會。

臺大醫院平素雖備受各方指責，但正如葉曙所諷，「最妙的是，儘管你罵得怎麼厲害，臺大醫院好像不曾聽見似的，從不答辯或要求改正，既像是在以不變應萬變，又像是麻木不仁，無動於衷。」<sup>58</sup>但對這次監院警長的自殺事件，院方與校方的處理態度，卻是截然不同。不只魏火曜院長在新聞見報當天立即去函解釋原委，傅斯年校長更是立刻召見魏火曜，親自造訪臺大醫院，並派人著手調查事實真相，迅於一週後在《中央日報》上，親自署名發表臺大方面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根據兩位在場證人的訪問陳述，強調醫院方面並無醫療疏失，希望各界不要作無謂的揣測，一切靜待司法調查。魏、傅兩人的反應之迅速，不只一反醫院過去麻木不仁的故態，更耐人尋味的是，傅斯年竟在調查報告的最後，公開向社會大眾暗示道：「關於臺大醫院的一切，和學校對這個醫院的方針，我已經寫好一文，因須送有關單位一看，所以十幾天後才可發表。」<sup>59</sup>顯然劉希聖的自殺，雖是一個非預期的偶發事件，但卻如天上掉下的禮物一般，讓臺大醫院與校方「幡然醒悟」，決心要徹底解決臺大醫院的問題。這是因為劉希聖的身份特殊、來自監院的壓力，或是臺大方面另有所圖，答案就很令人迷惑了。就如同傅斯年調查報告中那句「須送有關單位一看」一樣，令人猜不透堂堂臺大校長寫關於臺大醫院改革方針的文章，還須送給哪個單位「一看」才能公開發表？顯然問題的背後真相，絕不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般單純。

傅斯年這篇未演先轟動的文章，題曰〈關於臺大醫院〉，自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在《中央日報》第5版上連載，全文長達一萬多字。史學名家出手果然與眾不同，很快引來各界側目。傅斯年以校長及附設醫院直屬長官的身份，痛批臺大醫院舊有的日本制度，具有相當的落伍封建性，不符時代的需求，認為此後應向具有「服務精神」與「科學管理」的美國醫院學習<sup>60</sup>。另外傅斯年在該文中也從「世界醫學」的角度，批判臺大醫院的舊制度與舊觀念，使得人才招募

<sup>57</sup> 〈劉希聖怎會自殺？ 劉侄申訴是被逼死的〉，《中央日報》第5版，1950.10.13。

<sup>58</sup> 葉曙，《病理卅三年》，頁152。

<sup>59</sup> 傅斯年，〈劉希聖君在醫院自殺事件之調查〉，《中央日報》第5版，1950.10.21。

<sup>60</sup> 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頁266-267。

不易<sup>61</sup>。

在說明了臺大醫院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關鍵，全在不合時宜的日式制度之後，傅斯年便對院內「很少數人」主張繼續採用日制、不願改行進步的美式制度以符合世界醫學的最新潮流，展開嚴厲的批判<sup>62</sup>。

對於傅斯年所言臺大醫院的改造方案，及對「少數人」不願配合改革的批判，代表黨政立場的《中央日報》，在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長文連載完的隔日，立即以一篇題為〈社會進步的無形阻力〉的社論，表明支持的立場，並且擴大解釋傅斯年的改革理念，痛批臺大醫院改革的阻力，同時也是國家社會改革進步的阻力，認為這「少數人」如同導致大陸失守的黨政要員一般，只知維持現狀，不思時時檢討改進<sup>63</sup>。這可說是一篇預警意味十足的社論，黨中央將傅斯年文章中少數不願配合改革的人，定位為「抱殘守闕」的份子，並且還對其扣上「障阻三民主義革命進展」、「阻礙國家社會改造」的大帽子，將單純的反對臺大全面進行美式體制改革的人士，與在中國大陸時阻礙三民主義革命以致喪失大陸的黨政中樞人士，劃上等號。其批判矛頭所指為何人，實意在言中。杜聰明在如斯強烈的黨政高層與校方壓力之下，如不屈從，去職似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 四、杜聰明告別臺大醫學院

##### 1. 二度歐美行與錢思亮的逼退

其實，如果硬要把杜聰明說成是推動美式醫學教育與醫院制度的絆腳石，顯然是對他的過度批評。杜聰明雖然身受德日式講座制教育，但他也知道其中優缺點皆有，不必然是絕對優越的制度。在一九四九年傅斯年來臺推動臺大改革後，杜聰明深知一味崇奉德日制已不可行，在該年度臺灣醫學會總會的致詞上，就婉轉對外表達出他個人對於德日制與英美制孰優孰劣的看法，論述中雖含有相當程度的妥協性，但也表明自己絕非死守德日式醫學的頑冥之輩<sup>64</sup>。

但是杜氏這種「立基於德日醫學、兼採英美醫學優點」的論調，顯然並不能讓急於配合美援要求、全面推行美式醫學制度的黨政高層接受，因此會有一九五〇年的連番改革批判行動。在杜聰明堅不請辭之下，為免引來醫學界敬重杜聰明地位者的過度反彈，黨政高層決定採溫和手段，對杜聰明動之以情，希望能經由對美式醫學的瞭解，進而欣然接受美式醫學在臺大的全面施行，於是有新一波的

<sup>61</sup> 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頁 267~268。

<sup>62</sup> 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頁 268~269。

<sup>63</sup> 〈社論：社會進步的無形阻力〉，《中央日報》第 2 版，1950.11.22。

<sup>64</sup> 杜聰明，〈臺灣醫學會第 42 屆總會開會致詞〉，《杜聰明言論集 第 1 輯》，頁 446~447。

「感化」杜聰明的行動出現。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就在前一波輿論批判臺大醫院缺失之後不到一個月，杜聰明接獲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獎學金，提供他一次留學美國及歐洲的機會，出國期間暫由葉曙代理其職務，這是杜聰明繼日治時期之後的第二度公費留學。如果以杜聰明的年齡和在醫界的地位而言，他獲得這筆獎學金，顯然是有些兒「意外」的。按常理，應該把這個機會留給其他較年輕的教員去歷練才是，在那個出國不易的年代，能拿公費出國留學是極其光榮的事，醫學院教員如此之多，會讓身為院長的杜聰明取得此一難得的機會，這其中顯然頗有深意<sup>65</sup>。雖然形式上杜聰明是以 WHO 獎學金的名義出國，但在幕後主導的，卻是另一個美援機構——美國醫藥援華會（ABMAC），杜聰明在美國的大部份參訪行程，也都是由 ABMAC 代做安排。而當時 ABMAC 的駐臺代表，正是數度與杜聰明交手的醫界大老劉瑞恆。所以這一次由 WHO 資助的歐美遊學，事實上可說是主要美援機構的 ABMAC 留給杜聰明最後一次反省檢討的機會，希望藉由對進步的美國現代醫學設施與教育的實地參訪，改變杜聰明向有的尊崇德日制的觀念，回臺後能夠坦然接受新的美式制度的改革方案。

杜聰明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出國，至隔年七月十二日回臺，其間滯美五個月，留歐二個月。參訪的重點，除了杜氏本身專長的藥理學相關施設之外，也包括美式的醫院行政管理與醫學教育制度，特別以 ABMAC 的大本營——紐約的 Columbia 大學為中心，安排杜聰明住宿於此，並得以就近考察其醫學院院長室、藥理學教室與生理學教室等，當然也順道參觀了附近其他的醫學院<sup>66</sup>。目的無非是希望杜聰明能親自體會美式醫院與醫學教育制度的優點，讓其能在回臺灣後主動配合推行美式制度。不過，此行帶給杜聰明的改變，似乎十分有限，雖然在美國的時間遠遠超過在德國的時間，但顯然杜聰明觀察到的重點與體會，與美援單位的期待，有相當大的落差。如同第一次奉派出國時一樣，杜聰明依舊保持每隔幾天寫信回臺灣的習慣，但從其留學時期的幾封信的內容來看<sup>67</sup>，似乎未對資助單位費心安排的美國醫學參訪行程有特別的讚許。信中所透露出的訊息，滿是他長年不變的德日情懷，頂多認為美國的制度有其不同於歐陸的優點，但並不認為美國必然一切皆凌駕在德國之上。

<sup>65</sup> 關於選派教授出國，臺大當時的辦法是由申請人中選擇二、三名，主要是依年資決定，由醫學院長選完再送請校長決定，不過，美援會另有省籍的考量，同一年度外省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參葉曙，《病理卅三年》，頁 157）。杜聰明的年資當然夠久，但以醫學院長之身份決定自己通過申請，似乎不無「自肥」之嫌，杜氏當不致自私至此。所以他的出國案，背後恐怕是有相當政治考量的。

<sup>66</sup> 杜聰明，《回憶錄》，頁 206~208。

<sup>67</sup> 杜聰明，〈歐美旅途家書〉，第 26、27、35 等信，《杜聰明言論集 第 1 輯》，頁 477~489。

在杜聰明這次出國留學期間，臺大的人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爲令國人遺憾的，是傅斯年校長在杜出國後不久，竟意外在省參議會的質詢過程中發病，本有高血壓的他，當晚即因腦溢血急救無效身亡，事出突然，全臺震驚<sup>68</sup>。遺缺在幾經協調後，於次年由教務長錢思亮接替。杜聰明在接獲葉曙的通知後，在回信中也提到「傅先生自就任以來，對我臺大，交涉經費，整頓內容，頗見進步，他竟忽然撒手，實在很可惜的事。」<sup>69</sup>（第3信）的確不錯，雖然在改革臺大（醫）學院之事上，杜、傅二人可能有不少摩擦，但是若非傅氏以其學術地位與聲望，抵擋住來自黨政高層與美援單位的壓力，杜聰明的醫學院長一職恐怕早已不保，而今傅氏過世，杜聰明能否久安其位，更成了未知數。

雖然歷經長時間的考察，但是杜聰明對於美式醫學教育並無特殊好感，覺得日本式教學較優的基本看法，並未因考察行程而有所改變<sup>70</sup>，而杜聰明這趟七個月的歐美遊學，似乎成了他臺大醫學院長任內的「畢業旅行」。在未能密切與校方及黨政高層配合的情況下，當局者對杜聰明的容忍，終於在一九五三年的上半年，到達最後極限。這一年，臺大校方爲求改善醫學院教學，成立了一個「醫學院計劃委員會」，七名委員的名單，包括臺大醫學院內的董大成、高天成、葉曙、嚴智鐘，校外學人有劉瑞恆及國防醫學院正、副院長盧致德與彭達謀以及美籍人士畢德遜（Dr.P.Q.Peterson），而由劉瑞恆出任主任委員<sup>71</sup>。這份名單所顯示出的意義，其中董大成是臺大醫學院第一批公費赴美進修的教授之一，高天成日後接替魏火曜當臺大醫院院長，嚴智鐘曾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短暫取代杜聰明任醫學院長，葉曙則是與劉瑞恆關係良好，且曾在杜出國期間代理醫學院長，而劉瑞恆素來與杜聰明頗有心結，其他兩位國防醫學院的委員代表的應是軍醫系統的力量，畢德遜則是當時美援會的主管。從此組合看來，此一委員會不僅是刻意把杜聰明排除在外，而且可說是擺明針對杜聰明而來，居心不無可議之處<sup>72</sup>。難怪杜會憤

<sup>68</sup> <傅斯年先生昨猝然病逝 列席省參會時突患腦溢血 多方救治無效竟溘然長逝 各方聞耗同感悲悼>，《中央日報》第1版，1950.12.21。

<sup>69</sup> 杜聰明，〈歐美旅途家書〉，第3信，《杜聰明言論集 第1輯》，頁464。

<sup>70</sup> 據魏火曜說，當時多數臺大教授在從美國考察回臺後，大多不再反對新的美式制度，唯獨「杜聰明先生是比較特殊的例子，他一直是欣賞日本教學的，即使到美國考察之後，仍然堅持原來的看法。」參詳見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57。

<sup>71</sup> 錢思亮，〈臺大的改進與發展〉，《中央日報》第3版，1953.8.12。

<sup>72</sup> 基本上這個委員會是起因於1953年2月臺大與Columbia大學大型合作改進醫學院教育的計劃失敗後，美援會爲求名正言順以改善臺大醫學院教學爲名，提供經費補助而行植入美式醫學教育之實的一個組織，其詳可參魏火曜，〈臺大醫學院十六年〉，《傳記文學》第1卷第7期，1962），頁35~38。從其成員結構，即可探知幕後主導者爲何，美援會當然不願意不肯接受美式制度的杜聰明加入，這可算是美援會對杜聰明已忍無可忍的一次表態，而臺大校方接受這樣的人事安排，足見黨政高層已有與杜聰明撕破臉正面衝突的準備。



憤不平地批道：「假使余無資格不能做醫學院長，余亦相信可以做一個委員」<sup>73</sup>。至此，連委員也做不成，杜方知大勢已去，但仍不願主動辭職。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他的院長任期屆滿前一週，錢思亮突然登門拜訪，表明校方希望他主動請辭的心意，杜聰明依舊要錢思亮不發續聘書即可，他決不願主動請辭<sup>74</sup>，再度展現他個性中倔強不服輸的一面。三天後，在臺大第 249 次行政會議上，杜聰明發表離職演說，對自己被迫辭職的原委細說分明，並在最後對中國式的大學，發出他最後所能做的一點批評謂：

中國之大學，包括臺灣大學，余看不起，這是一個 School，不是 University，余最後希望錢校長，能夠給臺灣大學發展之<sup>75</sup>。

告別演說完四天後，杜聰明正式卸下臺大醫學院院長的職務，遺缺在幾經協調折衝後，由當時人還在美國考察的臺大醫院院長魏火曜接替<sup>76</sup>。

## 2. 杜聰明去職因素檢討

### a. 政治力干預的蠱測

綜觀杜聰明最後之所以被迫辭去臺大醫學院院長的過程，最重要的應該還是時空背景轉換下的結構性因素，國民黨當局亟需美援以發展醫學教育與公共衛生，美援之來當然與臺灣方面是否能全面接受美式醫學有關係。而杜聰明卻根深蒂固地認為，美式制度不見得是最優的制度，還是希望以德日式為主，頂多只參考英美制作部份的改善，這樣的做法，自然不能見容於美援單位。杜的去職，誠如接任的魏火曜一針見血式的說法，是由於「那時美援會和臺大當局希望改革臺大日本式醫學教學，但杜院長和一批年輕醫師不願意改，所以無法繼續讓他當院

<sup>73</sup> 杜聰明，〈國立臺灣大學第 249 次行政會議上之演說〉，《杜聰明言論集 第 1 輯》，頁 569。

<sup>74</sup> 杜聰明，〈國立臺灣大學第 249 次行政會議上之演說〉，《杜聰明言論集 第 1 輯》，頁 569。

<sup>75</sup> 杜聰明，〈國立臺灣大學第 249 次行政會議上之演說〉，《杜聰明言論集 第 1 輯》，頁 570。

<sup>76</sup> 有關醫學院長的接替人選，臺大校方、美援會及杜聰明三方面，應該有過一番相當激烈的爭執，為不使人事問題成為不安的來源，雖然當時臺大醫學院內有多名人選皆有資格接任，最初錢思亮是屬意由外省來的葉曙接任，但為葉曙所拒。（參葉曙，《閒話臺大四十年》，頁 19，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最後是由本省籍、留學東京帝大但頗能配合美式制度改革、且與杜聰明無師承瓜葛的魏火曜出線，成為各方皆可接受的人選。而當時魏火曜正在美國考察，一開始接到錢思亮的電報後，隨即回電婉辭，院務則暫由嚴智鐘代理。魏在回國後，對於自己超越向有的醫界倫理（因為醫學院內的郭松根與高天成皆為其長輩級教授，高天成且是他東大時期的學長），頗感不安，遲遲猶豫不敢受命。幸得當時美援會的主管 Dr.P.Q.Peterson 及劉瑞恆與錢思亮、葉曙等人的強力勸進，杜聰明也勸他要接下這個擔子，魏才勉為其難地接受，其醫院長遺缺則由高天成接替。詳參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 49~50，以及魏火曜，〈臺大醫學院十六年〉。

長。」<sup>77</sup>至於背後黨政高層到底對臺大校方施加了什麼樣的壓力，實非局外人所能揣測，但應該也不會置身事外才是，魏火曜就曾含蓄地透露：「據聞一九五二年時美援會對臺大施加壓力，杜先生原本不肯走，但還是被逼走了。當然，其中還有很多政治因素。」<sup>78</sup>。

黨政高層是否曾將其黑手伸入臺大校園而導致杜聰明去職，其實並非全無脈絡可尋。可能是爲了避免外界的猜疑與批評，就在杜聰明去職之後十多天，向來行事低調的臺大校長錢思亮，突然在《中央日報》上以〈臺大的改進與發展〉爲題<sup>79</sup>，發表一篇重要的書面談話，說明臺大在當時的辦學與人事狀況。從錢思亮的文章中，可以窺出黨政高層當時在臺大改革計劃中，其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原來所謂「醫學院計劃委員會」最初的提議，是由行政院長陳誠邀集教育部長程天放所擬定，委員會的成員雖經臺大行政會議通過，但最後的名單是由行政院會議核定，呈准教育部備案後才成立。

至此我們才發現，原來所謂的醫學院計劃委員會，並非由臺大校方主動提出，而是行政院授意所爲，其委員名單事實上也非臺大所能決定，而是由行政院方面「欽定」。所以杜聰明之所以在委員會名單中被剔除，應該是由行政院做最後決定，臺大方面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到底是誰在排擠杜聰明，答案似乎逐漸浮現。接著，錢思亮向外界解釋計劃委員會的位階與職能，也試著解釋爲什麼像杜聰明這樣的人卻不在委員之列，是因爲「名額有限」。其實任何略諳權力操作的人，一眼即可看出，這個由劉瑞恆出任主委的醫學院計劃委員會，正如同當時由他所出任主委的另一個中央層級的衛生設計聯繫委員會一般，是以美援作後盾，強勢主導臺大校務發展的機構。雖不負責執行，卻可扼住執行機構的經費來源之生殺大權，臺大校方充其量只不過是其配合機構罷了。所以爲什麼刻意不讓向來與美國方面不合作的杜聰明進入委員會，答案非常清楚。如果只是因爲名額有限，誠如杜聰明所言，「論經驗者，余可能比董大成君、高天成君、葉曙君，高之，論年齡者余比劉瑞恆君、嚴智鐘君年青的，論對學（校）外聘人者，國防醫學院長盧致德君以外，無必要副院長亦來參加之。」<sup>80</sup>區區國防醫學院副院長羅致而堂堂臺大醫學院院長被排除，其中內情絕不是一句簡單的「名額有限」所可敷衍解釋。

<sup>77</sup>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49。

<sup>78</sup>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51。

<sup>79</sup> 原文見錢思亮，〈臺大的改進與發展〉，《中央日報》第3版，1953.8.12。以下引文出自該文者，恕不另註出處。

<sup>80</sup> 杜聰明，〈國立臺灣大學第249次行政會議上之演說〉，《杜聰明言論集 第1輯》，頁569。

在說明了臺大的人事變動後，錢思亮在文章最後的結論，終於說出他真正言不由衷的原因。原來臺大的改進不是純為學術文化上的理由，而是另有其「高遠」的政治目標是要「使臺大能夠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計劃和反攻復國的大業」。顯然促使錢思亮在臺大進行改進的主因，既非出自他的主動意願，也非他所能全盤掌握。至於改進後的目標，也不在將臺大變成崇高的學術殿堂，而是能配合建國復國大業的樣板機構。

至於政府高層如何在背後主導臺大的改進計劃與人事變動，以達其所預期的目標呢？杜聰明的四子杜祖信在接受訪問時就指稱，其父生前曾告訴他們，要他去職的主要壓力，其實是來自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原因當然是與杜不願配合當局的政策有關<sup>81</sup>。

杜聰明會對陳誠有這樣的質疑，其實並非全屬空穴來風。就在錢思亮發表〈臺大的改進與發展〉書面談話的次日，黨營《中央日報》即以頭版頭條的重要篇幅，刊出行政院長陳誠呼應錢思亮的相關談話<sup>82</sup>。其反應之迅敏與配合之密切，與一九五〇年時《中央日報》以社論回應傅斯年的〈關於臺大醫院〉一文時的景況，如出一轍，同樣透露出頗不尋常的政治氣氛。陳誠以閣揆之尊，逾越主管大學事務的教育部，而直接對外公開發表談話，足見他本人對此事的關切程度。陳誠在談話中表明，「關於臺大的改進事宜，本人曾偕同有關教育行政當局，三度邀請各方面負責人士與專家學者詳加研討」，直言不諱在臺大改進的過程中，他涉入的程度甚深。另外他也指出臺大甚至整個教育界的使命，絕非純為學術而學術、教育而教育，而是負有更偉大的使命：「使學校社會與政府融為一體，使教育與國家的需要、政府的政策密切配合，將教育的功能充分發揮出來」。簡單地說，就是教育學術須為政治服務，他更明言批判在大陸時教育的失敗，主因就是「教育與政治脫節」，在臺灣絕不容許重蹈覆轍。

從前述《中央日報》那篇〈社會進步的無形阻力〉的社論，到錢思亮書面談話的結論與陳誠相呼應的公開談話，都顯現出一個「黨國主體／臺大附屬」的論述脈絡，即臺大醫院或臺大的任何改革，都不只是單純的教育或學術文化問題，而是聯繫上社會進步、國家發展甚至反攻復國大業的無限上綱問題，不能純以「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的簡單邏輯視之，而政治顯然是凌駕於教育自主與學術自由之上。政府的目標既在建設臺灣與反攻大陸，當時這二者皆需美國方面的大力相助，因此，對於少數不能配合美國要求的人，也就等於是與政府作對，當然

<sup>81</sup> 參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245。

<sup>82</sup> 〈關切臺大改進發展 陳誠院長發表談話 發揮教育功能糾正不合理現象 成立理工農醫計劃會改進〉，《中央日報》第1版，1953.8.13。以下引文出自該文者，恕不另註出處。

不能容許其繼續混跡臺大。循此論調，被當局認為「抱殘守闕」、「冥頑不靈」的杜聰明，便成了當權者務必除之而後快的首要目標。對此，陳誠為免外界質疑他干預臺大人選，在公開談話中，還特別說明他對臺大人選異動的看法，並特別強調：「聘請教授是學校的行政權，任何人不能任意干涉」，但是，「職權與責任是對等的，政府既課校長以責任，即應尊重其職權，校長依其職責，以人格與學問足為師表者，作聘請教授之標準，自然是萬分正確的」，暗諷杜聰明不被聘的原因所在。

陳誠的說明，其實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既將臺大的改進視為重要政治任務，且曾三度親召專家研究，而又以刷新人事作為改進臺大的第一著棋，則豈有放任臺大校長自由決定人事之道理？若是校長意見被當局認為「所聘非人」，一切改革豈不前功盡棄？若是臺大校長真有如此不受干涉之人事決定權，豈不又中了陳誠自己所嚴詞批判的大陸時期「教育與政治脫節」的弊端？硬說行政院方面不曾干預臺大的人事調整，恐怕只是自欺欺人的片面之詞而已。分析至此，杜聰明最後之所以被迫去職的真正推手為何，可說是再明白也不過了，錢思亮無情的登門逼退，其實可能也不過是在為黨政高層扮黑臉罷了。

#### b. 杜聰明的個人因素

不過，除了時空轉換的結構性因素及政治因素之外，要徹底瞭解杜聰明離開臺大醫學院的原因，還要從杜聰明的行事作風等個人因素去探討，才能清楚為何他的去職，竟連他的醫學院同事或學生也沒能立即站出來力挺他，終使他孤立無援地黯然離去。在這方面，魏火曜把杜聰明去職的結構性與個別性原因，說得最為言簡意賅：

杜先生在日據時代時去過歐美，他不喜歡歐美式醫學教育，認為日本那一套好，當然，他不願意更改醫學院教育，其中恐怕也有一點意氣。日本的講座教授，可以自由支配講座的人事和經費。他自己做研究拿到博士，所以非常自負<sup>83</sup>。

在杜聰明任臺大醫學院院長期間，最為人所詬病的，正是他自負的個性，與在人事與經費上的處理態度。個性無是非，姑且不論，但在人事與經費上的處置不當，則極易為自己樹敵，進而引來批判之聲。綜觀現有的資料，杜聰明之所以在臺大醫學院失勢，與他在這兩方面的缺失，恐怕有相當大的關係。

<sup>83</sup>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 51~52。



先說人事問題。由於日本式的講座教授擁有絕對的人事任命權，幾乎是「教授說了就算」，並不須經過什麼行政程序的認可。享受慣如此權利的杜聰明，在戰後似乎依然故我，而經常與臺大校方起衝突。例如他曾經允諾一位在中國東北開業的臺籍醫師，若願意回臺就有辦法讓他在臺大當教授。豈知該醫師舉家返臺後，杜卻無法說服院內的年輕同事與臺大校方，人事案不能通過，而致該醫師對杜非常地不諒解。另外有一次杜聰明想聘一個年已半百的人來當助教，被傅斯年在行政會議上當場否決，讓彼此關係很不愉快<sup>84</sup>。另外，杜聰明也曾想運用他的關係，聘用幾位七十幾歲的開業老醫師來任教，但都在人事審查會議上，經過激烈的討論後，一一被否決掉了<sup>85</sup>。

葉曙和杜聰明在用人方面意見的衝突，還不止於此。另外有一次葉曙有意一次申請三、四個畢業生為助教，杜聰明原本認為不宜一次採用這麼多助教，最後在葉曙力爭之下，以考慮基礎病理學的特殊需要而勉強答應<sup>86</sup>。葉曙對杜聰明的為人，有些地方甚至是幾近於人格的指控<sup>87</sup>，顯見受傅斯年與劉瑞恆重用的葉曙，與杜聰明的關係其實相當緊張，這可能也是杜聰明不願依葉曙之意改變作風的原因。但從任用老醫師、老助教這些事來看，杜聰明的用人原則，確有可疵議之處。

可議的還不止於此，不按正常的行政程序用人，可能只是延續其久任講座教授的習慣作風，如果是將醫學院視為私產，只用自己中意的人，以致有「結黨營私」之譏，問題就比較嚴重。這本是用人的大忌，但杜聰明卻在這方面受人批評不少。如與董大成同為臺大醫學院第一批派赴美國留學的鄭翼宗醫師，就曾說出他在戰後早期自日本回臺任教前的一段不尋常經歷，說當時因杜聰明「企圖以臺灣大學出身者霸佔醫學院，形成日本方式的學閥是眾目昭彰的」，因此傅斯年找他面談是透過魏火曜而非杜聰明，就是恐杜因他的學歷出身而從中作梗<sup>88</sup>。

<sup>84</sup> 詳參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 51。

<sup>85</sup> 楊思標等編，《楓城四十年》，頁 62。

<sup>86</sup> 杜聰明，《回憶錄》，頁 225。

<sup>87</sup> 如他曾這樣批判莊長恭校長與杜聰明：「莊長恭先生正式上任，萬沒想到此公糊塗得不明是非，不辨賢愚，聽信杜先生之言，遠君子，近小人，把杜先生又恢復其院長職務不說，還用了一位莫名其妙的總務長，將總務處的幾名忠實組長全部撤換，弄得校務一團糟。」又說「（莊校長）來醫學院參觀各科，由杜聰明先生領著走馬看花般地巡視一番而已，……好像是懷著百般委屈，被迫來敷衍公事一般。……後來仔細一打聽，原來他被人所愚，用了一批無德無能的人，把整個臺大行政弄得一團糟。」（見葉曙，〈初期臺大的人與事——閒話臺大四十年之一〉，頁 74）。這些對杜聰明嚴厲的指控，實已不啻是對其人格的挑戰，可惜葉曙文章發表時，杜已過世，沒能看到杜的反駁。由於葉、杜之間的爭議，可能牽涉當時臺大內部極複雜的本省外省教職員間的人事鬥爭，所以葉曙對於杜聰明的指控，只可作為參考，恐怕不能盡信。

<sup>88</sup> 鄭翼宗，《歷劫歸來話半生——一個臺灣人醫學教授的自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頁 233~234。

另外，傅斯年也曾談到他對臺大醫學院內有人想要搞派系的不滿，但也表明問題不全是出在杜聰明身上：

我初來時，似乎得到一種暗示，（關於醫學院全體，即包含醫院及熱帶醫學研究所兩個大附設機構。）「你去弄錢，事我們辦」，我也只有裝聾作啞。……至於人事呢……我卻也請了一位教授，是臺灣省籍在日本學的。我先問杜院長：「這位學問好嗎？」「好。」「人好嗎？」「好。」於是我二人決定了。等到開會時，忽然接到幾個醫師的信，反對。我頓時火起，我說：「我在此地一定想盡方法培植臺灣省的人才，然而萬萬不容許把持！休想把持！」這樣一來，通過了<sup>89</sup>。

傅斯年或許是不願直接開罪杜聰明，才用了比較婉轉的敘述，來表示他對少數人想要「把持」醫學院人事的不滿，這其中不管杜聰明是否真如鄭翼宗所說的那般不堪，至少在縱容醫學院內有如此學閥觀念一事上，他身爲一院之長是難辭其咎的。

筆者不認爲鄭翼宗或傅斯年對杜氏用人無章的看法，是出自於意氣，因爲連杜的得意門生許燦煌，在杜所創立的臺灣化學製藥公司服務一段時間後，選擇黯然離去，他也認爲杜在用人上不能突破家族主義與親友的羈絆，老是停留在封建思想的家族主義窠臼中打轉，因而發出感歎說：「平心而論，杜博士的個性適合潛心於實驗室的研究工作，企業界瞬息萬變的風雲舞臺應該不是他的戰場。」<sup>90</sup>果然，這家績效不佳的公司，在許燦煌離職幾年後，杜聰明也因負責而辭去董事長的職務<sup>91</sup>，成爲他行政工作的另一個敗筆。不論是在企業或學校，用人不當都成了杜聰明受人批評的致命傷，這是他不能不深自檢討的地方。

接著談到醫學院的經費問題。或許也是延續自日治時期講座教授可自由運用經費的習慣，杜聰明在任醫學院長時期，也常在醫學院經費不足時，伸手向其所屬的附屬醫院要錢。因爲戰後最初杜聰明一個人身兼兩職，醫學院與醫院財務互通，雖在體制上可能有問題<sup>92</sup>，但顯然杜習於以人治凌駕法治，圖方便而罔顧醫學院與醫院間的財務分際，導致醫院方面的怨言。魏火曜就說，雖然在制度上，

<sup>89</sup> 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頁 277~278。

<sup>90</sup> 許燦煌口述、曹永洋記，《鴻爪履印——許燦煌博士自敘傳》，（臺北：清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42~44。

<sup>91</sup> 杜聰明，〈臺灣化學工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第 68 次董監事會董事長辭職致辭〉，《杜聰明言論集 第 2 輯》，（高雄：私立高雄醫學院，1964），頁 236。

<sup>92</sup> 據李鎮源的說法，「醫學院與醫院的財務，早在光復之初即已獨立，但因杜先生身兼兩院的院長，難免讓人誤會財務結構是互通的，其實不是的。」見楊思標等編，《楓城四十年》，頁 55。

醫學院不應向醫院拿錢，因為沒有上級單位向下級單位要錢的道理，但杜聰明卻不以為然。曾因研究經費不足，而派祕書向醫院方面取錢，魏要求要有正式的憑據，杜聰明即不悅地認為，「自己人」不應如此計較。結果那筆錢日後被醫學院總務拿去放高利貸倒了帳，沒能還給醫院。傅斯年知情後，還特地下了公文要求此後醫學院不得再向醫院要錢，雙方鬧得很不愉快<sup>93</sup>。傅斯年在〈關於臺大醫院〉文中也談及這個事情<sup>94</sup>。

杜的同事葉曙也曾談到，在杜聰明赴歐美遊學而由他代理院長的期間，他為臺大醫學院師生向校方爭取到一筆經費，原分辦公費、學生實習費與教員研究費等三個項目，為免相互挪用，還特地交待會計人員不得混用。豈料杜聰明回國後一接手，又將三個項目合而為一，把經費開支弄成一筆糊塗帳，氣得葉曙日後還找了一些不滿杜聰明作風的教員組織聯誼會，發揮對杜聰明的牽制力量，並且不客氣地批評說：「杜先生的行政能力並不差到那裏，可是他做事沒有原則，還有點公私不分」<sup>95</sup>。

顯然在人事與經費上的處理態度所衍生出的種種問題，導致杜聰明在臺大醫學院喪失人和、缺乏奧援，引來各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質疑。這就不能歸咎於時代轉變下的無奈，而是他個人的問題，再加上政治力介入的推波助瀾，被迫去職便成為杜聰明無法逃避的下場。

## 五、結語

日治時期的臺灣醫界，是社會的菁英，也是社會的良心，帶領臺灣民眾從事反殖民、反歧視、反壓迫的政治社會運動。戰後早期的醫界人士，仍對建設臺灣、報效祖國，懷有一定的理想與熱情，「以醫輔政」成為多數醫師的願望。醫政雙方的關係，堪稱良好。但是一場二二八事件的屠殺慘禍，讓很多醫界人士從此退出政治舞臺，甚至喪失寶貴生命。整個臺灣的醫政關係，在「二二八」之後，起了重大的變化。國民黨政權在政治上的箝制加強，醫界人士不是選擇對政治噤聲冷漠，便是退回自己的專業領域，在醫學技術或醫學教育上力圖表現，「以醫遠政」的現象浮現。而國民黨政權也漸知醫師在臺灣社會上的重要性，有鑑於「二二八」的教訓，「以政制醫」的政策手段逐漸出籠。

時至一九四九年大陸失守之後，國府播遷來臺，靠著美援的協助重建政權，

<sup>93</sup> 詳見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紀錄，《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頁 52。

<sup>94</sup> 傅斯年，〈關於臺大醫院〉，頁 269。

<sup>95</sup> 葉曙，〈值得一記的幾個聯誼會〉，《閒話臺大四十年》，頁 39。

大批大陸醫界人士來臺，臺灣的醫政關係，也摻雜進複雜的國際政治與族群情結等因素。為求配合美援以鞏固政權，醫藥衛生領域也難逃政治力的干涉，特別是臺灣醫界不論是在醫學教育與臨床診療上，又都有著濃厚的日本味，更是當局亟欲整頓的目標。外省籍的醫界精英，因為能配合國府與美方的需求，往往成為當局整頓臺灣醫界的馬前卒。而當時居醫界龍頭的臺大醫學院與附屬醫院，便成為國府「以政干醫」的首要標的。成功地整頓臺大醫學院與醫院，除可展示與美方合作的誠意外，更能向臺灣社會展示政府的實力，一個新的「以政領醫」的時代又將來臨。

在這段國府向臺灣醫界展現「以政制醫」、「以政領醫」實力的時期，杜聰明身居醫界要津的臺大醫學院院長之職，而成為最能體現當時臺灣醫政關係變化的關鍵人物之一。雖然不服輸的杜聰明，幾度想以一己之力，行「以醫抗政」的掙扎，但卻仍不敵強大的政治壓力。再加上他個人行事作風引人疵議，本身的學問與處世觀念並未能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改變，依舊固守自日治以來的風習。最後終於在黨政高層的政治壓力下，被迫自臺大醫學院長去職，成為戰後初期臺灣醫政關係惡化下的祭品。

